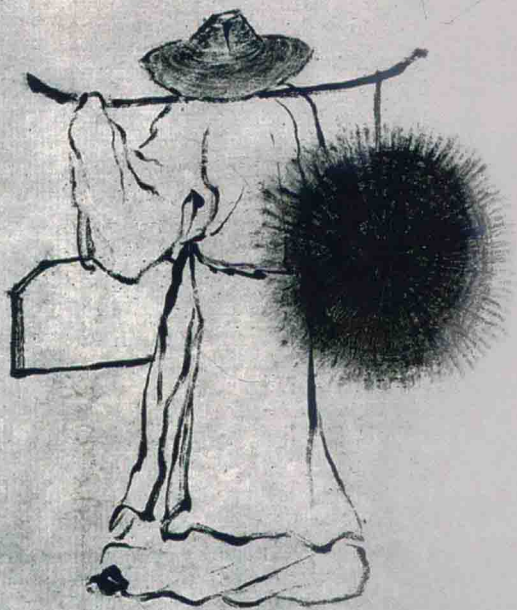


#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王汎森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修訂版)



斗笠先生不  
 知何許人也負  
 國擊手版行跡  
 天涯聲斗道  
 我不化你書經  
 造像我不化你  
 利淘爾僧也不  
 化你心疼的銀  
 錢地土只化你  
 本有的良知良  
 能一念中有些  
 差池玉更頭還該醒  
 認做塵碎楓園歸  
 帳時終須結總

休  
 丙寅年並書

#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修訂版)

王汎森 著

#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

2013年4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680元

2014年6月二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王 汎 森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編輯 沙 淑 芬  
校對 吳 淑 芳  
封面設計 蔡 媿 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387-3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 序論

這一本書的編選經歷過兩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熱心的朋友發動了一個計畫，希望在大陸出版一套台灣學者的論著選集，每本約四十萬字，當時我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但是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應該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經集結出版的文章再集結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準備這個選集。最初的設想是要收入我從明清到近代思想學術方面的文章。我以這樣的面貌規畫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連導論〈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的邏輯〉也都寫好了。最近當我決定應該為這件工作做一個了斷時，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概念浮現在我腦海中，亦即縮小範圍只收集與清代有關的文章。

依我個人觀察，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四股力量往往交織在一起，像「風」一樣吹掠而過，形成無處不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像毛細管作用般，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這本

書中有多篇文章都與前兩股力量有關。幾經思考，我決定用書中篇幅最長，且從未發表過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書名，並加上一個副標題<sup>1</sup>。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題，並不表示它涵蓋了本書每一篇文章的意旨，這是首先要聲明的。

—

我之所以遲遲未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完成，原因很多。我在寫成這篇文稿之後，發現前前後後有若干的問題是應該同時解決的。預想中的題目包括〈晚明遺獻的復活〉等文，但是我始終沒有時間好好將這些長文寫成。

本書中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相關的幾篇文章，我稍後再說。此處先介紹這本選集最開頭的幾篇文章，它們分別討論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起。這五個方面正好是明清思想轉型的幾個主軸。我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還有若干篇文章與「轉型」有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第一篇文章是〈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該文以「去形上化」為主軸來討論清初學術思想的一個特色，因為有這一個特色，所以清初思想家看社會與自然的眼光皆產生了變化。該文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藉「寶珠」或「種子」兩種觀念來說明先天預成式的人性論之式微。第二部分是以四書(特別是《大學》、《中庸》)地

---

1 收在本書的文章只有〈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與我多年前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重複，其餘都未收入我的任何論著中。

位之下降說明此一現象。第三部分是以江浙心學社群之去形上化來說明這一段歷史。第四部分則由樸素的原始儒家哲學的興起來說明形上玄遠思想之沒落。第五部分則由清初程朱陸王兩派皆顯現的「去形上化」來證明這一趨勢的普遍性。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主要在談明末到清初「禮治理想」的興起。我認為這不純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問題；不純然是學術的運動，而是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由於晚明以來四民社會秩序的動搖、士風的敗壞，和高度商業化後高下標準的變動，使得士人感到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想、標準來矯正，儒家的「古禮」便成為士人標舉的規範。

17世紀，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發動了一場以「禮」為主軸的清整運動，寫作各種糾正風俗的小冊子，希望賦予各種身分恰當的行為舉止與規範，或可稱之為舉止的一場行為革命。「禮治」運動中，除了呼籲及闡發禮治理想之外，也有許多人深入基層，編纂及推廣各種實用性的參考冊子，可見當時人們認為「心性之學」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經失靈，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為主義」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禮治社會」的理想，有光譜的濃淡之別，以回到「古禮」為最濃的一端，較淡的一端則是朱熹的《家禮》。禮教運動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與佛、道化的禮儀，或受其沾染的禮儀對抗，其中以喪禮最為顯著。文章的內容在強調清初三禮學研究的興盛，以及禮學學術社群的形成，與上述現實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清初的講經會〉一文則是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之形成、思想脈絡、進行方式、會友、治學風格，以及其影響所作的研究。這篇文章論證講經會之形成與明代後期道德價值的混亂失序、社會政治上的頹敗，以及異族入侵的壓力、改朝換代後對社會政治問題上的反

省等都有關。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爲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爲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實上，某種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傳下，「繼承」傳統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學習拉丁文就沒辦法繼承古代拉丁傳統一般。

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的轉化，包括了兩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文章是想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而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組織爲例來說明。

這兩篇文章同時也說明了道德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我認爲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分，到了明季，隨著社會

風俗之敗壞，在部分王學信徒中，省過、改過便成爲一個很熱烈的論題。但由於陽明的「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爲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爲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分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雖有寬、嚴之別，卻是此後士人世界一個強勁有力的傳統。尤其當社會失序或國家混亂之時，人們往往祭出這個辦法，強力地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地組織自己散亂而沒有中心的生活，鍛鍊自己成爲「道德化政治」的先鋒隊、把自己鑄造成像曾國藩那樣旋乾轉坤的人物。而這個傳統，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力量。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一文旨在說明四事：第一、晚明通俗宗教及善書的流行與明末清初修身日記的大量湧現；第二、修身日記反映出17世紀思想界的幾種變化，包括由玄轉實，由悟轉修的傾向；第三、在晚明那種知識分子群體性活動風起雲湧，動輒千百人的講會逐步消歇，老師與學生當面印證的場合漸次減少之後，日記所扮演的角色、規過會的興起，以及它們反映的道德嚴格主義的氣氛；第四、修身日記的流通仍局限在士大夫階層，與功過格等那樣普及群眾的善書不同。我們也可以從日記的內容中看出社會救濟色彩的淡薄，以及天與被罪等宗教色彩的開始等現象。

這兩篇文章是我試著聯繫「思想史」與「生活史」兩個領域之



作<sup>2</sup>。柯靈烏(Robin G. Collingwood, 1889-1943)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歷史是由思想造成的，所以思想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像是微血管般周流全身。試想如果不是政治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改變，人類政治怎麼可能從法國大革命一路演變到今天？反過來說，生活、制度或現實當然也塑造人的思想，這兩者相互激盪，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力量。我認為「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開啓了一片廣大的研究天地，如兩者之間聯繫的節點，如思想的傳布與擴散，如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種文本、修辭，如思想通俗化的過程，如通俗文本中的思想元素，如思想與各種眼光、觀點的形成等等，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課題。

這一組文章的第四篇〈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原是為一部中國經典系列叢書中《明夷待訪錄》一書所寫的導論，我之所以將它收在這裡，是為了說明17世紀政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變化。本文除了討論《明夷待訪錄》的幾個思想主軸，還特別提出該書的一個重要特質，即它一方面嚴厲批判古往今來因為君權之私而導致制度、社會的敗壞，並指出三代以下各種制度設計中潛藏了帝王之「私」的性格，而黃氏主張統治者應該以「公」的原則來規劃合乎三代理想的制度，這個原理幾乎貫串《明夷待訪錄》一書中所有的層面，使得它在17世紀政治思想的新發展中變得相當特別。

本文也討論了《明夷待訪錄》一書在清代的流通，說明它雖然從未出現在各種禁書目錄中，但很快地被政治禁制「漣漪效應」波及而銷聲匿跡，目前得見的少數本子中甚至有以明夷卦的卦畫作為書名以

---

2 相關論點，請參見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第1期(天津)，2010，頁16-31。

逃避政治忌諱的。這也部分說明了該書為何不像盧梭的《民約論》那樣在問世之後不斷擴大影響力，形成巨大的歷史動能。文中並且提到它在道光之後屢次重刊的過程，正好可以與經世實學思想的崛起，以及我接著介紹〈禁書復出〉那一篇的內容相互關照。

## 二

本書的另一組文章主要是在講「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個觀念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傅柯對權力的了解有非常大的貢獻，他不像過去的人只注意權力在公開的大場面上的展現，例如制度、政策、暴力、處罰、拘捕、閱兵等。他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空間中作用的狀況。所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是說權力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每一個角落，每個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響。我借用這個觀念來說明我廿年前所做的一個清代的政治與文化的研究，該文討論在清代的政治壓力下，文化領域中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自我刪節的現象。

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一個主題下，原先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寫作計畫。但目前我只完成了三篇，即〈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這三篇是一個連環套，它們討論清代的政治壓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政策；另一方面是造成一種無邊的氛圍產生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在「風」吹掠的當頭及以後，人們祕密地調整自己、壓抑自己。在〈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一文中，我已提到各地對這個案件「創造性」的反應，包括不由自主的猜測、衍繹、自我壓抑等。而

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我則借用包括寫作、出版、藏書等等難以想像的許多案例，說明在龐大政治壓力下文化活動的進行。自我壓抑的現象在過去的研究中被過度忽略了，事實上這類事例之多，遠非文字所能形容。我認為我們討論清代歷史，尤其是涉及思想、學術、政治等方面，如果不把這個方面考慮進去，是不可能對政治壓力所形成的無處不在的潛在性剝削有比較完整的解釋。而且我也注意到過去二、三十年間研究者，傾向於迴避這個主題，或對之視而不見。我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一文，則是討論一個人們先前不怎麼注意的現象，即這些被禁毀，或是在肅殺空氣之下消失無蹤的書籍，如何又成群地回來。在後面我還要結合晚清歷史，比較詳細地討論一下這個現象。本書的第四組文章主要是在講清代中期思想學術史。

清代中期考證學如日中天，在這個時期，學術思想世界到底是「黃茅白葦，一望皆是」，或是在訓詁考證之外，還有若干值得我們注意的發展？〈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兩篇文章是我在這方面的嘗試。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一文討論了幾個較為複雜的問題：第一、本文處理一個胡適所留下的難題。胡適一直想了解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思想人物——程雲莊，程氏對明末清初以來的思想界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史學界卻又始終無法了解他的面目。胡適曾經將這個問題請教明清史權威——孟森，卻未得到任何解答。本文利用了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孤本《程氏叢書》，試著解答胡適在七十幾年前所提出的學術公案，即程廷祚(1691-1767)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程雲莊(1602-1651)之間的思想關聯。第二、近三百多

年來，不斷有人提及程雲莊，但因為不曾讀過他的文集，所以對他的思想內容掌握不確，本文透過《程氏叢書》釐清其思想之大概。第三、本文將程雲莊與程廷祚之思想交涉作一梳理，認為在瓦解邵雍、朱子的形上體系這件工作上，程廷祚受了程雲莊之啟發而展現清代中期思想的一個特色——即「尋找平實、淺近的聖人」。同時也對考證學盛行時，學術界的另一種動向，即清代宋學之特質提出一個定位。第四、本文也對胡適當年建立「顏李→程廷祚→戴震」這一思想系譜時的若干成見作了檢討。

至於〈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一文，主要是認為章學誠在乾嘉考證學如日中天的時代，對古代著述之實況提出了相當具有前瞻性的論斷。章學誠一方面受當時考證學的影響，同時也孤明先發，揭露了古代著作及知識流傳的實況，並對作者、著作權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譬如他說古代不認為著作是「私」的，知識是為了公共之用。古人不忍諱抄錄他人文字，倘能致用，根本不在乎原來的作者是誰。他說古代的著作是以「篇」為單位，而不是以「書」的方式流通，而許多「書」事實上是「文件集」。同時章氏的著述觀念也支持了他「君師合一」、「道、學、政合一」的理想；這個政治思想的提出，與清代中後期的社會情狀有密切的關係。章氏揭露了古代的知識是以合乎道而施於用為貴，他認為後世為了凸顯個人的見解或創獲所形成的作者觀及智財觀念遠離了古代的情狀。這樣的觀點對乾嘉考證盛世時期「著書滿家」的情況，也是一種極具針對性的批判。章氏對於古代著作觀的論點，在清代及民國時期並不受人注意，但像余嘉錫這樣敏感的學者在《古書通例》中即大幅繼承了章學誠的論點。章學誠、余嘉錫的這些見解，多已被近代出土的文物所證實。

本書的第五組文章，討論嘉慶、道光、咸豐年間思想界的變化。

大概從嘉慶後期一直到道咸年間，也就是1800-1850年之間，是晚清的一個重大變化期。我注意到許多清代思想史、學術史，往往是在寫完考證學之後便接著寫洋務運動及西學東漸，但是夾在兩者中間大概有半個世紀的時間，卻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期。在西方，1800-1850也是一個重要的段落，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的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準備都在這個時期。所謂「道咸以降之學新」（王國維），在何種意義下為「新」，「新」的學術思想現象包括哪些成分，都是一個尚未被深入探討的問題。〈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及〈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這兩篇文章，是在舉例說明洋務運動、西學漸入之前，帝國內部士人群體的新胎動。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一文，是為了我關心的一個歷史現象，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後成立的顧祠會作鋪墊。

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之後)，北京有一大批官員發起了祭拜顧炎武的活動，這個祠祭活動持續了七、八十年。本文是以顧炎武祠的建立為引子，藉《國史儒林傳》成書過程，重新檢討嘉、道年間思想文化歷史中，顧炎武乃清朝第一儒者的論斷是如何形成的；同時也討論了在形成顧炎武崇拜的過程中，士大夫圈如何編織了一個似有若無的「全神堂」。而官方功令、政治忌諱之逐步鬆弛與士人世界相應的變化，以及官方意識型態、學術、思想、社會幾種力量互相交織、轉變的情形。

為什麼選擇一種祭拜儀式作為了解這一段歷史的入口？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認為「文化」有部分是由一批模組或格式所組成。人們用它們來理解、詮釋社會經驗，人們也用它們

來表演自己給自己看的儀式。維持這些模組、格式的穩定而又能表達個別之意思，是維持一個社會或文化秩序穩定的要素。人們往往透過對套語、格式的再現，及在其中所作的細微改變，來說出自己的語言，其情形一如Natalie Davis在《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中所說的，犯人大多不識字，大多是由他人代為撰寫認罪書(Pardon Tale)，而認罪書有一定的故事模式，所以犯人們是用一些原先即已存在的故事模式在認罪，並乞求寬恕<sup>3</sup>。

在清代文化中也有一些格套、模式，對它們一再地運用與詮釋，是表達士人心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存在高度政治壓力的時代，如何把握人們思想情緒上可能的變化呢？我們可以從人們一再訴諸格套、模組，或故事題材中，從他們對那些看來老套的東西的衍繹，了解他們如何表達許多隱密、奧妙的情緒與思想。

祭拜白居易、黃庭堅、蘇軾等題材即是這種模組或格套之一。人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述、感喟、祭拜這些歷史人物，並透過這些行動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心緒。而道光二十三年之後的顧炎武崇拜即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

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前面已大致提及，在這裡，我想多費一些篇幅把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作一個比較詳細的交代。

我認為一部又一部禁書的復出一個又一個的溫度計。首先它們得以復出，至少反映了兩面事態：一方面是反映了政治壓力鬆弛的歷

---

3 以上參考了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ch. 3, ch. 4.

程，一方面是曲折反映了清代後期一波接一波新的關心的議題(這些關心不一定會坦直地表達出來)，同時也道出了若干意識型態世界的重要趨勢及轉折。

從清初到乾隆時代都進行過大規模的禁燬書籍的工作，而以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為高峰，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已經相當多，連當時辦理這件工作的相關檔案也已整理出版。但是一般人似乎只注意到許許多的文獻被禁、被燬，卻很少注意到有許多文獻在清代後期又重新回到歷史的舞台上來，並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在大規模禁書運動之後，大量的知識與記憶被壓抑下去了，尤其是已經刻印的書，但事實上還有不少從未刊刻的稿本，一些碑銘、畫像、遺址或帶有紀念意味的實物也因壓抑而消失，或進入不被人知的角落。故整體的結果是一種大規模的、刻意的集體遺忘，人們的知識與記憶空間被重新規範了，使得二百多年中占據人們思想意識世界主要位置的是另一批知識與記憶。

官方對於書籍的訊息所知仍然有限，故在官方的禁書目錄之外，還有許多「有問題」的書也悄然地隱入歷史的角落，我們如果披讀周作人、鄭振鐸、黃裳等人的藏書序跋及許多藏書志時，即會得到一個結論，有許許多多的文獻，因為政治空氣的緊張，或者是官方的大規模禁燬，即使並未列名禁燬書目中，也自動地銷聲匿跡二百多年。所以這是一個「漣漪效應」，向湖心丟下一顆石頭，它的漣漪會一圈一圈往外擴散，使得「敏感」不只限於官方所認定的範圍，而是廣大百姓心中對此「敏感性」的擴大詮釋。我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已將這些林林總總的自我壓抑現象作了交代。

但是禁燬及自我壓抑，並未根除了所有「有問題」的書，隨著我們對這方面知識的增加，尤其是近年來幾部套書的出版，我們可以知

道，大部分的書其實都還有少量的遺留。同時，還有刻印書籍的流通管道與抄本的流通管道之分，前者可能因事涉敏感而停止流通了，但後者因為簡便而且帶有祕密性，仍以比較私密的方式在某些地區流傳。

保留這些文獻的，尤其是提供重印的保存者，最大的來源是原著者的家族後裔。我並未作過精確的統計，不過就印象所及，這樣的例子占絕大多數。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它們在帝國發動大規模的清洗書籍運動時，或出於有意，或出於無心，保留不為帝國正統所容的東西。家族像一個深不見底的囊袋，留存了各式各樣的東西，它們似乎說明帝國穿透力的局限，到了家族的層次，帝國常須透過協議的方式進行控制。

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一文中，我已提到過，乾隆四十一年，皇帝決定褒諡明末忠烈之士，使得許許多多被禁抑的文獻可以藉著朝廷獎勵忠義節操的名義，重新被刊印。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通常在重刊這些文獻，會先做一番加工，將明顯有違礙的地方刪除或改動。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某些禁燬文獻的評論，通常也被用來作為重刊某書的保護。不過我有一種感覺，即使有上述幾道護符，人們在重刊時仍然戰戰兢兢，從他們為這些書所寫的序文可以聞出一種戒慎恐懼的味道，而且還有不少被皇帝公開褒諡者的文集，當時並未見有人重刊。

當然還有不少人是為了學問上的興趣，或根本是愛好新奇，重新發掘被禁抑的文獻。除了前述的忠臣烈士的遺集外，最早出現的一批書與文學有關，它們通常是忌諱最少，也是政治禁抑的力量逐漸鬆弛後，最早因人們的文化、學術上的興趣及商業利益而重新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一文中，我也提到了道光年間重刊的書最多，而這個時期重現的書大抵經世意味濃厚，尤其是有關邊疆、兵略、經世濟民，或實用性的書，它們分別反映了道光以來經世風潮的興起。爲了重振家族名聲或洗刷家族之名譽，也是重印禁燬書的重要動機，像李清《三垣筆記》的重刊即是一例。

到了晚清，當文字獄的壓力變小時，某些家族後裔會以自己家族曾經擁有過某些歷史名人或忠義之士而感到光榮，以刊印遺獻，作爲取得「社會聲望」的途徑之一。在某些個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些寒門子弟藉著獻上遺集給關心文化的地方官，以獲得他們的重視，通常他們還以請地方官寫序來拉攏關係，或以地方官的序來加重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sup>4</sup>。

太平天國及捻亂之後，重刊禁書的基調已有改變，由「經世」轉向「忠義名節」，許多人爲了重新振發人們的忠義之氣以對抗太平天國及捻亂而重刊禁燬書籍，而有些人則是爲了喚起種族意識而重印禁燬書籍——不過這一次的種族之別不是漢人與滿人，而是中國與西洋，過去禁抑不敢言，動輒惹禍的言論，這時有了全新的看法和意義，尤其是當西方列強入侵，西方的物質文化大舉滲入，許多士人覺得傳統生活及社會秩序遭到侵蝕，士大夫在這些明末的書籍及事跡中，找到了一帖救時的解藥。

最後一波，則是反映晚明多元文化的書籍重新出現在歷史舞台。這些書包括兩方面，一是思想有異端傾向的書，如李贄、唐甄等人的

---

4 有些出錢刊書的人並不完全懂得這些書的內容及意義，像廣東鹽商伍崇曜刊印的《粵雅堂叢書》中，有一些被禁燬的集子，伍氏刊印這些書，純粹是爲博得自己「費而好文」的社會聲譽而已。